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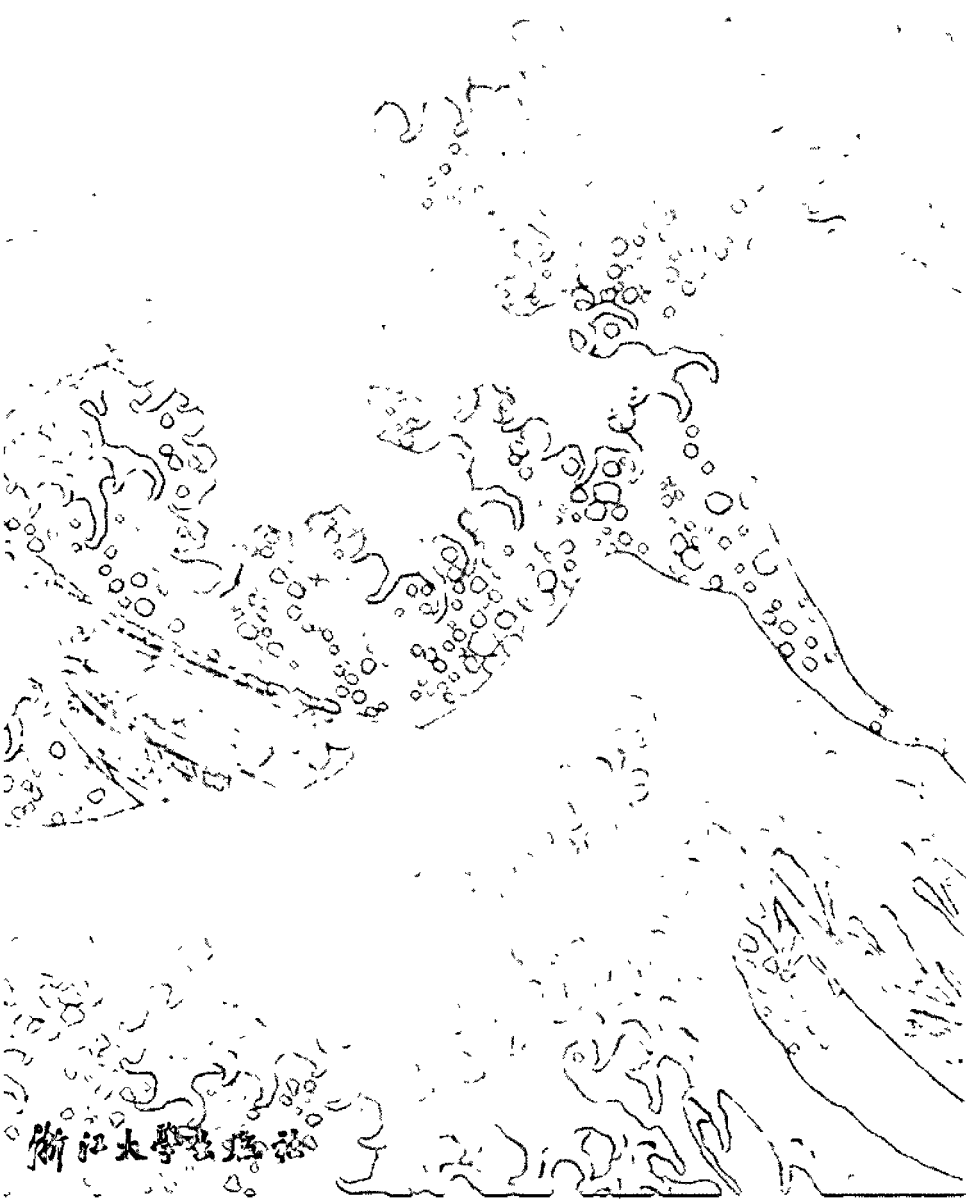


RIBEN JINGJI FAZHAN YU ZHENGFU ZUOYONG

日本经济发展与政府作用

王建宇 金元欢 著

浙江大學出版社



浙江大學出版社

RIBEN JINGJI FAZHAN YU ZHENGFU ZUOYONG

日本经济发展与政府作用

王建宇 金元欢 著



序

任何一种经济模式,使命是最成功的模式,都是利弊兼备的,而且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日本曾以政府与市场结合的最佳模式而倍受世人瞩目。然而,进入90年代,在“泡沫经济”的冲击下,日本经济陷入前所未有的萧条和衰退之中,经济复兴步履蹒跚,徘徊不前,用日本经济界惯用的语言即“缺乏真情实感地恢复”。特别是1996年度整个经济刚出现明显复苏势头,1997年4月以后又重新回落至低迷状态,乍兴即衰。对1998年度日本经济前景的预测,大多数学者认为仍将是零增长年。那么,日本经济沉疴不拔的状况究竟由何而来?其症结何在?日本还能否挥去“泡沫经济”的阴霾?

造成日本经济停滞不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表面和近期的因素看:其一,日本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错误的财政紧缩政策,包括1997年4月起将消费税由3%提高至5%,废除特别减税制度,削减公共投资等,使本来就“内需不足”的经济雪上加霜,其总效果相当于减少了12亿日元的需求。其二,“泡沫经济”的后遗症,加

之政府金融政策的苍白无力,导致股价和地价大跌的“资产贬值效应”和经济过冷,使金融机构的巨额坏账不但迟迟得不到清偿,且数额还有增无减。关于不良债权的总规模,大藏省曾几次公布数字,截止1997年9月,不良债权总额达76.7万亿日元,约合5900亿美元。从深层次或长期因素看,由于日本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在追赶欧美和快速经济增长下呈现出“制度疲劳”和“系统疲软”,由此引起了经济结构性的持续衰退。正如日本经济企划厅指出的:“曾在战后经济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的日本市场经济体制,在近期的外部环境急剧变化中正陷入了疲劳状态。”此外,还可从日本经济制度内部的缺陷来探讨其经济不振的原因。对之下面要具体分析,这里先不作详论。

伴随着日本经济的长期不景气,特别是效仿日本模式完成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虎”,1997年以来也都先后传染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并发症。这就给人们提出了一个理论和实际的问题,即以日韩为首的曾创造了世界经济奇迹的东亚模式,为什么在90年代后都相继陷入了困境之中?这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东亚模式究竟还有无可借鉴之处?

首先,东亚模式所创造的经济奇迹,毕竟已经发生过了,是确实存在的。在近二三十年中,东亚实际收入翻了几番,经济增长在世界名列前茅,这一切了不起的巨大成就是举世瞩目而没有办法否定的。这一模式比较成功地解决了宏观计划控制与微观竞争活力的矛盾,降低了危机的破坏程度。其独特的产业政策为后发展国家在浓缩的时间内迅速赶超先进国家提供了样板;其严密的企业管理制度既缓和了劳资对立,又加强了内部的凝聚力和一致对外性;其终身雇佣制创造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其贸易立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为解决资源贫国、地理小国的经济发展开辟了道路。总之,这一模式对于后发育赶超型的东方国家具有普遍的指导和启示作用。

其次,对日本经济的现实状况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应作实事求是的估价。应历史地、客观地、发展地看待“日韩经济模式”,而不应该像某些新闻媒介和学术界人士那样人云亦云,作夸大其辞的评价和耸人听闻的议论。

八九十年代,面对日韩经济的突飞猛进及欧美经济的萎靡不振,国内外不少文章都在探讨亚洲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的成功奥秘,都在预言欧美经济的病入膏肓、不可救药,甚至到爆发“东南亚金融危机”前夕,对东亚模式仍是一片赞叹声,诸如“人类文明的发展进入了亚太时代”,“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世界经济的重心将从欧美向东亚转移”等等。在一片颂扬声中,也偶有不谐之音。如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 1994 年发表的题为“亚洲奇迹的神话”的文章认为,东亚经济发展会遇上“高墙”,不可避免地会走上前苏联解体的道路。其理由是:亚洲奇迹主要是通过增加投入和吸引外资实现的,但这些国家和地区皆缺乏自己的技术基础,技术创新成分对经济发展推动作用很小,所以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总和要素劳动生产率必然会下降,并进而引发一系列的问题。但在当时,克鲁格曼的这一番言论却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和攻击。

然而,近几年来,一边是日本经济原地踏步不前,另一边则是欧美经济蒸蒸日上,再现雄风。特别是 1997 年东南亚经济形势日益严峻,国内外又涌现出大量文章宣称“日本沉没论”,“东亚模式寿终正寝”,把昔日用来称赞日本的颂词“旭日东升”(Risingsun),改为“山姆中兴”(Risngsam),而克鲁格曼则被俨然推崇为东南亚风暴的预言者,他的推理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引证。这一切都颇耐人寻味。

我们认为,就日本而言,虽然直到 20 世纪末,其经济将难于走出“零增长”(增长率低于 1%),但其经济发展的潜力和生命力是巨大的。到目前为止,日本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和贸易顺差国,同时拥有世界第一的巨额外汇储备;日本的经济规模(GDP)占

世界 GDP 总和的 18%，相当于美国的 60%~70%；日本的人均国民收入达到 300 万日元，已超过美国；其国内收入差距小，储蓄率大大高于欧美，有 9.5 万亿美元的国内储蓄，即使大衰退也没有赤字记录；更重要的是，日本具有很高的教育水平、日本式企业管理水平和极强的国际竞争能力，有超强的经济抗震能力和自我修复能力，而且产业基础雄厚，产品的级数高，不易被替代，“东南亚金融危机”也难摧其根基。因此，日本经济的不景气不能与倒退和衰亡相提并论。比较确切的评价是：一种旧模式已走到尽头，需要升级转型。

再次，从根本上说，不可能用一种经济模式适用于经济发展的全过程。虽然日韩经济模式曾支撑了后发展国家经济的迅速腾飞，但这种模式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其局限性归纳起来有这几个方面：第一，模式本身存在着固有的矛盾和弊端。具体表现为：以政府宏观保护为核心，企业自保为中坚，国民崇尚国货的消费习惯为基础而构成的日本经济结构的排外性、保守性和封闭性，导致了日本与他国尤其是美国贸易摩擦日益加大，国际社会要求其开放国内市场的呼声越来越高；另外，在不少日本人中存在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精于算计、吝啬自私为特征的岛国根性妨碍了日本社会进一步国际化并引起国际社会对它的普遍谴责。第二，随着时间的推移，模式中原本运转良好的功能出现部分退化和磨损。具体表现为：官、商、学一体化的协调合作机制逐步被政、官、财三者相互勾结的“金钱政治”、“黑金交易”、贪污腐败所取代；而日本国民勤劳、节俭、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在减弱，骄傲自满、精神颓废等现象在滋生、蔓延。第三，在经济腾飞之后，伴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急剧变化，原有模式不适应新形势而出现许多新矛盾、新问题需要重新调整和修复。具体表现为：日本人一直引以为荣的企业管理的四大法宝——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内部福利制、企业工会制等，在“泡沫经济”崩溃之后，面临严峻挑战，已

失去往日的魅力和存在的基础。另外,法人间相互持股的企业组织形式,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虽曾起到了企业集团之间相互依存、风险共担、稳定经营和交易的重要作用,但当日本经济长期萎靡不振之时,相互持股就像一柄双刃剑,促使多米诺骨牌现象发生,即伴随着核心企业的成片倒闭,相互持股的外围企业也成片破产,真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而作为相互持股派生物的日本主银行制度,虽在经济腾飞之时为日本企业管好资金、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促成企业追求长远发展目标,避免短视行为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在经济运行不佳之时,密切的银企关系,又成为银企界限不清、权益纠缠、保护落后、封闭的罪魁祸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加快赶超步伐,节约时间和经费,日本政府长期奉行“拿来主义”和“搭便车”的模仿型经济。这种经济的特点,是直接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利用它现成的科研成果,重应用技术的开发,轻基础科学的研究。这种模仿型经济曾经是十分高效和便捷的,它推动日本经济迅速地发展。但当日本经济已接近世界最先进水平,经济发展再也无法靠模仿,而必须靠自我创新时,模仿型经济的支撑点开始动摇。与此同时,恰逢知识经济“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地取代工业经济来到了我们身边。在信息技术全球化的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和技术作为新的生产要素,凭借其自身强大的渗透力,深入到经济、生活、文化、社会的各个领域,并对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起着巨大的推动和决定作用,对人类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思维方式等都将产生不可抗拒的冲击力和影响力。知识经济的两大产业是信息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知识经济的灵魂与核心是人的创造力,而美国丰富的人力资源储备和创新的制度安排机制,为工业化向信息化社会的转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而它成为信息时代当之无愧的绝对领导者。据资料表明,进入90年代后,美国已连续7年,在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都较低条件下经济得到持续增长,其中的一个主要资源就是全美的5000家软件公司。在过去

的3年中,信息产业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55%以上,而曾经荣耀一时的建筑业和汽车业仅为14%和4%。由此可见知识经济的魔力。相反,日本受到模仿型经济的限制,产业取向偏狭,创新力度不足,加之整个80年代处于对美经济竞争的绝对优势地位而盲目乐观、自信,终于导致新一轮的产业升级受阻,在计算机、计算机软件、信息高速公路等方面均被生机勃勃的美国远远抛在后面。与此相关的是,其原有的国际产业结构中的工业国地位,由于受到来自欧洲和“四小龙”的前堵后追的两面夹击而开始松动,从而招致灾难性后果。为了防止制造业增长后劲缺乏,政府开始炒作房地产和证券业,由此形成了泡沫经济。目前,日本处于第二产业增长潜力枯萎、第三产业水深火热、新兴产业转型迟缓的艰难处境中。

综上所述,一方面,日本模式总体上说是应当肯定的,不能因目前的危机来否定这种模式的生命力;另一方面,这一模式尽管对落后国家赶超先进国家是适合的、有利的,但随着时易势移,其原有模式必然面临着转型的重任。换言之,这种政府主导型、政企关系密切的发展模式恐怕更适合于东亚国家初期阶段的增长;到了更高级阶段就需要调整和改变。我国与日本及东亚其他国家(地区)都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目前我们也面临着经济在短期内迅速赶超先进国家的重任。基于中日文化同源和东方文化的共性,以及经济上遇到的许多类似问题,无论是日本模式的成功经验还是失败教训,对我们均有重要的启示作用。这也是撰写和出版这本书的目的和落脚点之所在。

目 录

| | |
|-------------------------------|--------|
| 导 言 | (1) |
| 第一章 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轨迹 | (7) |
| 一、经济恢复时期 | (7) |
| (一) 在美军授意下政府厉行改革 | (8) |
| (二) “倾斜生产方式”与“道奇路线” | (12) |
| (三) “朝鲜特需”服务与《旧金山和约》的缔结 | (16) |
| (四) 日本政府的“产业合理化”政策 | (19) |
| 二、经济高速增长的起飞时期 | (23) |
| (一) 经济腾飞时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 (23) |
| (二) 起飞时期有利的国际环境和政府的因势利导 | (27) |
| 三、经济低速增长和经济稳定增长的国际协调时期 | (35) |
| (一) 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和政府的经济对策 | (35) |
| (二) 日元升值和日本政府的应变能力 | (41) |

| | |
|-----------------------------------|-------|
| 第二章 战后日本政府的发展战略和经济计划 | (46) |
| 一、独辟蹊径的经济发展战略 | (46) |
| (一)贸易立国战略 | (46) |
| (二)科技立国战略 | (53) |
| (三)投资立国战略 | (59) |
| 二、引人注目的“经济计划” | (62) |
| (一)日本经济计划的主要特征 | (63) |
| (二)日本经济计划的编制程序 | (72) |
| (三)日本经济计划的制定方法 | (75) |
| 第三章 战后日本政府独具特色的产业政策 | (79) |
| 一、产业政策的概念 | (80) |
| (一)什么是产业政策 | (80) |
| (二)产业结构政策和产业组织政策 | (80) |
| (三)产业政策的必要性 | (83) |
| 二、战后日本产业政策的历史演变 | (85) |
| (一)“二战”后经济恢复时期的产业政策 | (85) |
| (二)“二战”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产业政策 | (86) |
| (三)“二战”后经济低速增长和转型时期的产业政策 | (107) |
| (四)“二战”后经济稳定增长时期的产业政策 | (119) |
| 三、产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 (128) |
| (一)产业政策的制定过程 | (129) |
| (二)利益协调——产业政策形成的机制性前提 | (133) |
| (三)产业政策的实施手段 | (136) |
| 四、对日本产业政策的评价 | (145) |
| (一)产业政策为什么在日本兴起 | (145) |

| | |
|---|--------------|
| (二)日本产业政策的作用与局限性 | (150) |
| 第四章 战后日本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范围和界限 | (153) |
| 一、“市场失灵”与“政府失败” | (154) |
| (一)“市场失灵” | (155) |
| (二)“政府失败” | (161) |
| 二、政府与市场 | (166) |
| 三、政府与企业 | (173) |
| (一)政府对企业帮而不代 | (173) |
| (二)作为企业扶持者和“保护神”的政府 | (175) |
| (三)作为企业间竞争维护者的政府与作为企业间合 作推进者的政府 | (177) |
| (四)充当民间企业的向导的政府 | (179) |
| (五)运用法律对企业进行高层次、高态势管理的政府 | (182) |
| 第五章 战后日本政府宏观经济调控有效性的前提和 基础 | (184) |
| 一、自民党的单独执政和比较安定的政局 | (184) |
| 二、高效节财、小巧精干的政府机构,精通业务、素质良好 的政府官僚 | (186) |
| 三、增加智力投资、强化科技意识、提高全民素质的教 育制度 | (194) |
| 四、官、商、学一体的决策体制 | (200) |
| 五、“日本式经营”的企业制度和企业的组织 | (203) |
| 六、大和民族的岛国心理及其文化传统 | (217) |

| | |
|--|-------|
| 第六章 启示与思考 | (225) |
| 一、日本政府主导型模式的成功经验给我们的启示 | (226) |
| (一)日本政府宏观调控指导思想之启示 | (227) |
| (二)日本政府宏观调控若干具体经验之借鉴 | (233) |
| 二、日本政府主导型模式弊端给我们的思考 | (239) |
| (一)日本经济结构的排外性、保守性、封闭性 | (240) |
| (二)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精于算计的岛国根性妨碍了 日本社会进一步的国际化 | (241) |
| (三)原本运转良好的系统,因部分功能退化须重新 修复 | (242) |
| (四)模仿型经济受到致命打击 | (243) |
| (五)产业结构亟待调整升级 | (244) |
| (六)“日本精神”和“日本式管理”的潜在危机 | (247) |
| 注 释 | (250) |
| 主要中文参考书目 | (259) |
| 主要外文参考书目 | (265) |

导 言

日本战后经济的迅速发展为世人瞩目。现代日本经济可以说是从战败的焦土和废墟上开始发展的。然而不到 30 年的时间,日本便俨然以经济大国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今天这个总面积仅占世界 0.3% 的岛国,国民生产总值却占全世界 10%,出口贸易额也占全世界的 10%,并且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对外净资产国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对外投资大国。“凡是有市场的地方,就有日本产品;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日本观光客”,此语是对日本经济大国形象的最好诠释。

日本“经济奇迹”令人惊叹,其经济成功是多种因素合力促成的结果。应该指出的是,其中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在多种因素中又起着主导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日本经济的腾飞是政府一手勾画出来的。

实践已经表明,在经济发展中,特别是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文化、地域条件等各方面存在着差异,因此各国政府在宏观调控的

目标设定、形式选择和运行特点等方面是不一样的。日本依据国情,选择了政府对经济强干预的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

日本原是一个后起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当日本资本主义刚刚起步的时候,欧美列强瓜分世界殖民地的斗争已经热火朝天。日本面临的出路是:要么沦为欧美殖民地,要么奋起直追,挤进列强之中。日本选择的当然是后者。但就自然环境而言,日本是一个岛国,地域狭小,人口稠密,资源奇缺,武力侵略可以开拓海外市场和弥补国内资财的匮乏。针对这一国情,要跻身列强,“耀皇威于国外”,成为统治世界“八纮一宇”的帝国,就必须把“武国扩张”作为最高国策。为此明治政府提出了两个口号,即“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强兵是殖产兴业和富国的手段。富国强兵既可抵御外侮,免于沦为欧美列强殖民地,又可征服他国,攫取原料基地和商品销售市场。因此,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起步就深深地打上了军事侵略的烙印。事实是:1874年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1876年强迫与朝鲜签订不平等条约——《江华条约》,1894~1895年发动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与美、英等西方七国组成八国联军进攻中国,1904年为争夺中国领土进行日俄战争,1914年出兵中国山东半岛,1931年侵占中国东北,1937年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自己遭到灭顶之灾,才使其靠军国主义来称霸世界的美梦彻底破灭。在战争废墟上怎样重新崛起?侵略扩张的老路肯定是走不通了,前思后想,环顾左右,加之美军进驻日本后对日方针政策的引导,日本终于逐步走上了一条在美军核保护伞下,通过发展经济来谋求民族振兴的富国轻兵的资本主义道路。

从历史渊源和文化背景上看,在日本个人主义、自由观念受到排斥和压制,国家利益至上、群体精神、集体主义得以不断提倡和发展。在上述国情和文化传统面前,资源小国日本要在浓缩的时间内迅速赶超欧美先进国家,要通过经济腾飞来达到振兴民族的

目的,就需要国家有更多的集权和对经济强有力的干预与引导;而崇尚国家、集体至上的价值观又为国家加强宏观调控作好了心理上的准备。因此在日本最终构建了独具特色的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这种模式的主要特征就是:一个具有强烈的经济建设意识并尽可能廉洁的行政精英实施的稳定高效的政治领导,一个遵循市场原则和利用经济手段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强有力的政府,一个政界财界官界相互协调、密切配合的政财官的复合体。

综观国内外探究日本问题的各类著作、论文,或者是侧重于研究日本某一方面、某一领域的问题(如《日本的新技术革命》、《日本高技术发展问题》、《日本的产业组织及产业组织政策》、《战后日本对外资的利用与管理》、《日本海外直接投资》等书),或者是偏重于分析日本经济起飞的综合因素(如《战后日本的经济起飞》、《战后日本经济腾飞之谜》、《日本的起飞与选择》等书),而对于构成日本腾飞的各种因素的论述,可以说是观点各异,见仁见智。但总的看来,专门研究日本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研究政府宏观调控的经济职能方面的著作、论文不多;即使有,也是淹没在综合研究的海洋之中,没有抽出来作单独、系统和细致的思考与分析。

本文在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突出日本政府宏观调控这条主线,从政府对经济作用的角度来探讨日本走向世界强国之路的奥秘。其基本思路是:通过对日本政府宏观经济调控(或称宏观经济管理)的内容、方式、手段、界限以及宏观调控有效性前提的分析来阐明日本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为日本经济的迅速腾飞并进而跻身世界经济强国提供了一条“高速公路”。而所谓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可以概括为:以政府为主体,以整个国民经济为对象,通过制定明确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计划,运用独具特色的产业政策和各种经济、法律和行政指导等手段,遵循市场经济原则,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进行以间接为主、直接为辅的管理控制和干预。

根据上述基本思路,全文分为六个部分。

第一章,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轨迹。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即1945年到1954年的经济恢复时期,1955年到1974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也即起飞时期,1975年到1984年的经济低速增长时期,1985年至今的日元升值后经济稳定增长和国际协调时期。本章主要是简介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历程,并对经济发展各时期政府宏观经济政策、措施,以及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作了概述,以便从整体上把握政府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大背景,避免脱离时代特征孤立地看待政府的经济行为和效能。

第二章,战后日本政府的发展战略与经济计划。本章的重点之一,是论述日本政府制定的一系列经济发展战略:贸易立国战略、科技立国战略和投资立国战略。通过研究,使我们看出这些战略为经济的发展提出了明确的发展目标,是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职能之一。本章的重点之二,是探讨政府战后拟定和实施的一系列经济计划。通过对日本经济计划的主要特征、编制程序、制定方法的论述,使我们认识到,日本的经济计划具有广泛性、指导性、灵活性、预测性等特征,并集科学性、民主性、可行性为一身,为经济发展、企业经营指明了方向,协调了各方利益,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是独树一帜的。

第三章,战后日本政府独具特色的产业政策。本章是全书的重点,这是由产业政策在政府宏观调控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所决定的。可以说,日本政府干预和介入国民经济运行的政策措施,几乎都是围绕产业政策展开的。产业政策是各项经济政策的“龙头”,是政府干预经济成功的最强有力的工具。政府通过制定和施行产业政策来加速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组织合理化、资源配置最优化,为落后国家赶超先进欧美国家提供经济超常增长的最优路线。同时,也正因为产业政策,才使国际社会对日本经济的“淘金热”经久不衰。全章从四个问题来论述产业政策:第一,产业政策